

讲真话：科技传播的社会责任

金涛

科技传播承载的社会责任很多，诸如信息的交流，科学精神、观念和思想的弘扬，宣传党和国家的科技政策，普及科技知识，报道科技事件及典型，揭露迷信及伪科学案例，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等等。这些，对于从事科学传播的媒体都是责无旁贷的。不过，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或者说科技传播当前的第一要务，是要讲真话，不仅科学传播的媒体本身要讲真话，还要大力提倡说真话。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把讲真话作为科学传播当前的第一要务？道理说起来简单也很简单，把讲真话作为科学传播当前的第一要务，实际上是把讲真话作为传播科学精神、观念和思想的前提和体现，因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是追求真善美、反对假丑恶的。如果科学传播也说假话，背离了求真务实的宗旨，那么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就是一句空话了。

具体说来，还可以列出以下几个理由。

(1)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讲真话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时代，那也是假话盛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年代。不仅政治上如此，科学传播方面也是如此。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是介绍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的学术生涯的，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生物学领域摩尔根学派与米丘林学派之争。文章说，1948年谈家桢代表中国遗传学界出席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遗传学会会长穆勒教授。他在开幕词中说到，刚结

束的苏联农业科学院大会通过的决议，把孟德尔—摩尔根主义宣布为“烦琐哲学”、“反动的唯心主义”、“伪科学”、“不可知论”的遗传学说，强调遗传学家信奉“米丘林主义”还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世界观在生物学中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仅如此，苏联关闭了细胞遗传学等有关实验室，开除并逮捕了坚定的“摩尔根主义者”，销毁了有关的教科书，消灭了用作遗传学实验的果蝇。以后，谈家桢又获悉，苏联农业科学院奠基人、遗传研究所和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所长、著名遗传学家瓦维诺夫教授遭到逮捕并被迫害致死。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然科学领域，持不同的学术观点，讲真话，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苏联的事，若干年后也在中国重演。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坚持生物学中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认为摩尔根遗传学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严厉指出：“当前我国生物科学的现状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要用米丘林生物学彻底改造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这篇措辞严厉的文章对我国遗传学的研究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种粗暴的干预，导致了我国生物科学的停滞和倒退：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说，科研中有关摩尔根遗传学说的课题也被中止，学术刊物只发表李森科一派观点的文章。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就在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建立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预示着遗传学发展到分子遗传学

收稿日期：2011-05-04

作者简介：金涛，高级编辑，科普作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Email: jintao1940111@163.com。

的新阶段（以上见谈家桢著《基因的紫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

遗传学在苏联、中国的遭遇，只不过是特殊年代发生在科学领域的一个例子，类似的情况很多，如粗暴地取消人文地理学、批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明自然科学同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由于意识形态方面复杂的原因，也会出现讲假话成风、压制真理的悲剧。这种情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流毒甚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的科学传播媒体所持的立场和发挥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2) 今日之中国，政治氛围发生很大变化，广开言路，学术民主已是社会的主流。因为政治原因而讲假话、不能讲真话的历史已成为过去，滋生说假话的土壤似乎不存在了。但是，现实是无情的，尽管人们不再因为政治的需要而大讲假话，可为了实际利益的需要而不讲真话，仍然是今天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假话盛行，假话的衍生物——废话、空话、套话、鬼话、胡话、瞎话屡见不鲜，唯独不讲真话的现象依然存在。著名作家巴金在他的晚年向世人发出讲真话的呐喊，在他重要的作品《随想录》中，巴金说，他需要提倡三个字：“讲真话！”

最近，两位总理在不同场合的讲话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讲真话，颇为耐人寻味。2011年4月13日《朱镕基答记者问》英文版在伦敦举行首发式，播放了朱镕基用英语讲述的视频，他说：“我不敢说这本书立论如何正确，更不期望每个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我只想说，我在本书中的讲话都是真话，这是我一生坚持的原则。”香港《联合早报》（2011年4月13日）新闻的标题是：“新书首发式朱镕基《答问》‘都是真话’。”意味深长。

仅隔一天，4月14日，温家宝在与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也说：“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在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作用。”从温总理语重心长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讲真话还

需要执政者鼓励，是因为讲真话的人不多，相反，讲假话依然大行其道。否则温总理也不会说“我们鼓励讲真话”。

不仅如此，温总理的讲话中也涉及了当前为何人们不讲真话的客观原因，或者说是原因之一吧，就是没有“听真话的条件”。

所以，他强调指出：“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谁来创造条件？怎样创造条件？创造什么样的条件？这都是值得探索的现实问题。

至于为什么今天讲假话成风，除了温总理所说的没有“听真话的条件”，还有一个功利主义的原因，具体说来，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普遍感到，讲真话仍然要付出很大代价，轻则会得罪人、讨人嫌，重则招致打击报复、穿小鞋；讲假话恰恰相反，可以取悦上司、被提拔重用、加官晋爵，何乐不为。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说假话、弄虚作假成为国民性的痼疾，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正是如此，“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提倡讲真话首先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有听真话的雅量和胸怀，不能再搞什么“阴谋”、引蛇出洞、打棍子、扣帽子、秋后算账。

提倡讲真话就是提倡学术民主，不搞“一言堂”，允许有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允许争鸣。

提倡讲真话是建设和谐社会、树立诚信的道德规范的前提条件。如果假话成风、假货泛滥、弄虚作假成灾，社会矛盾将会愈加尖锐，是很危险的。在这方面，科学传播的社会责任是至关重要的。

(3) 以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为己任的科学传媒，在我看来，在提倡讲真话、杜绝说假话方面，在改善社会风气、弘扬正气方面应该发挥带头作用。这是缘于科学是真理的化身，科学是严肃的、尊重事实的，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因而在大众的心目中，科学的声音往往最有权威、最具说服力。如果科学传播忘掉了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科学精神、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就无从谈起，社会就会失去诚信的根本、是非的

准绳、道德的底线了。

正是如此，温总理把“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视为政府让人民大众“在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为了市场竞争的目的，弄虚作假的种种不良风气也浸染了圣洁的科技领域。例如某些科技含量较高、价格不菲的民用电器，为了垄断市场、追逐高利润，厂家往往以不必要的升级换代迅速淘汰仍然能够使用的产品，并以种种手段（如没有零件、无法维修等方式）变相地逼迫消费者掏腰包购买新开发的产品。这种霸道的企业行为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如果说上述行为仅限于牟取暴利，这原是资本的属性，虽不合理却可以理解；那么媒体屡次曝光的论文抄袭、学术造假以谋取学位、职称或项目资助的不择手段追逐名利的丑闻，却是暴露了科技界的不正之风和学术道德的丧失。更加隐蔽的是，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案例，如为了利润而改换药物名称，为了增加医院收入让患者进行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健康的检查，以及为了长远的利益开发出使患者终生无法摆脱的药物等，所有这些，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科学技术已经堕落为金钱的奴隶，玷污了救死扶伤的高尚旗帜了。当然，我希望这只是个别的现象。

除了这类明目张胆地或触犯法律或违背社会公德的现象，更多的还是人们司空见惯却习以为常的观念仍在支配人们的思想、主宰决策者的行为，而这些观念恰恰是违背科学、违背常识的。

举一个经常见于媒体的例子：在自然灾害来临的抢险救灾的行动中，各国的救援工作都贯彻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首先要保护救援人员的安全，在这个前提下再去抢救幸存者。这是普通的常识，也是“以人为本”的正确解释和科学精神的体现。那种不顾救援人员的人身

安全，不顾客观情况盲目瞎干，造成救援人员伤亡的悲剧，应该追究指挥者的责任，受到道义的谴责。但是，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媒体的报道中（也包括传播科学的媒体）却是违背科学精神，传播了误导群众的虚假新闻，其负面影响十分恶劣。例如去年12月5日中午，发生在四川甘孜州道孚县鲜水镇孜龙村呷鸟沟的草原火灾。这个草原，据媒体报道，不过200亩，是些小灌木林，即便全部烧光也没有多么大的损失。但是在山火面前，由于指挥不当、临阵慌乱、对风向火情缺乏了解，居然导致参与抢险的15名解放军战士、5名老百姓、2名林业职工共22人遇难。我对这些牺牲的战士和群众深表悲痛，为许多鲜活生命的意外死亡深感惋惜。我没有看到这场草原火灾的后续报道，但我认为仅仅追认他们是烈士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追究瞎指挥的当事人的法律责任！除此之外，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抢险救灾的法律法规，按科学规律指导人们的行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保护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是十分迫切且非常重要的。要知道，每一个参与抢险救灾的士兵或其他人员，他们身后都有一个家庭，他们有父母、妻子、儿女，保障他们的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每个人的安全。

讲真话，不讲假话，使之成为社会风气，说起来容易，真正落实却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常言道：“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时有余。”社会如人，沾染了恶习就像吸毒一样不易戒掉。著名学者王元化说过：“学会讲话只要一二年就行了，学会讲真话却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敢于秉笔直书、说真话，这就需要真诚的愿望、坦荡的胸怀、不畏强暴的勇气、不计个人得失的品德，同时还需要对人对己都要有一种公正的态度。”

如果科学传媒能够率先垂范，以讲真话为荣，提倡讲真话，使假话没有市场，必定是科学精神发扬光大之时，则中国大有希望。